

《隋志》与魏晋南北朝赋学

范增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据《隋书·经籍志·集部》的著录及有关资料,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文体辨析的发达,“赋”的内涵和外延渐趋明晰,故而逐渐与骚、七、颂等文体区别开来,成为一独立文体,且为目录书单独著录。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具有了相当规模。理论探讨方面,与汉代相较,六朝不唯赋论材料明显增多,研究亦更为系统。

关键词:《隋书·经籍志》;赋体辨析;魏晋南北朝;赋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3-0065-07

赋被视作汉代文学的正宗,有汉一代,不仅赋家辈出,赋作也汗牛充栋。向、歆父子整理群书,开始辑录西汉诸家之赋,后又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删录。在《七略》和《汉志》中,“诗赋略”的独立无疑标志着文学特性的认识已在文献整理中得到反映。然而汉人的文学观念只是萌芽,对文体的关系认识还不够深入,因此楚辞作品与赋乃至杂辞、隐书之类在《汉志》中才会一并著录。可以看出,在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的观念还颇为模糊,文体分类的意识尚在萌芽阶段,对赋这种文体的认识还不能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明确和细致。自赋作为一种有别于诗骚的新文体产生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理论上对它的研究和探讨。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等均在文学创作或史书编撰中表述了他们的赋学观,对魏晋南北朝及以后赋之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我们似可以说,赋之研究在两汉时期已出现萌芽,而赋学的最终形成,还须等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而从《隋书·经籍志》及相关文献的著录可以看出,赋学发展至魏晋南北朝,已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完备的学术格局。

一 赋体的辨析与集部赋的单列

西京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东京班固在此基础上又撰《汉志》,文体辨析就此萌芽。由于还处于文体辨析的初期,故汉人对文体的分类还不十分明晰。汉代不仅骚赋同称,而且七体、对问设论体亦为赋体之属,甚至颂赞箴铭亦与赋同体异用[1](94页)。至魏晋南北朝,文体辨析逐渐发达起来。曹丕《典论·论文》已提出文体的特征问题,陆机《文赋》又有进一步的阐述,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及所附《志》、《论》则总结了这一时期文体辨析的成就。南北朝时期,以萧统的《文选》为代表,文体析分更为细密。在刘勰《文心雕龙》中,文体研究居于全书的中心地位,占了很大比重。《序志》篇将文体研究的内容归纳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表明,文体研究至齐梁时已趋于成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赋体的内涵和外延才逐渐明晰,进而与相近的各种文体区别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赋体辨析的成果,在《隋志·集部》的著录中有较全面的反映。

收稿日期:2001-11-08

作者简介:范增(1975—),男,四川省隆昌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李大明教授。

首先是楚辞单独建类,从赋体中分离出来。曹丕《典论·论文》称“诗赋欲丽”,仍与汉人观念一致,将赋作为一大体,而“骚”当包含于内。晋人皇甫谧仍骚赋不分,《三都赋序》说:“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义。皆因文以寄上,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2](卷四十五)皇甫谧弟子挚虞因之,在《文章流别论》中将屈原、荀卿、贾谊之作称为“古诗之赋”,将“近代辞赋”称作“今之赋”[3](卷五十六)[4](卷五百八十七)。从目录书的著录看,《汉志》始将骚赋一并著录,后来李充、王俭所撰目录书因之[5]。到了梁朝阮孝绪《七录》中,“楚辞”才开始成为单独的一类,编于别集、总集、杂文之前^①。这一体例被《隋志》承袭。《隋志·集部》分为三种,曰:楚辞、别集、总集。与阮孝绪《七录·文集录》所立四部相比,删并了“杂文部”。“楚辞类”著录“楚辞”专书十一部,略有四类:一是注释训解之作,二是拟作,三是音义之作,四是专题研究之作。“《隋志》这四个方面的著录,体现了……‘楚辞’别为一种的学术意义”[6](118页)。对于“楚辞”从赋中分离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体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体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对“楚辞”的辨析促成了这一文体的独立,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赋的特征认识更为深刻的结果,二者相互影响。“楚辞”的单立,同时促进了对赋体的辨析;“楚辞”研究格局的形成,也必然对赋学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是七体与赋的分离。在汉代,七是赋体之一,枚乘《七发》即被认为是汉赋之始。枚乘之后,《七发》代有拟作。曹植作《七启》,其序称:“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辨》、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2](卷三十四)后来,由于摹拟之作增多,七体的特征就逐渐固定下来,成为有固定模式的独立文体。挚虞《文章流别论》论文体源流,就对赋、七分别进行了讨论。挚虞认为“《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之后,“其流邃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3](卷五十七)[4](卷五百九十),辨体思想甚明。《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有傅玄《七谟序》,亦追溯了七体的源流,表达了他辨明七体源流的思想,这或许是傅玄编纂七体总集《七林》^②的动因。六朝时编纂的七体总集还有谢灵运《七集》、

卞景《七林》、颜之推《七悟》等。赋与七体分离的观念又为南朝时刘勰和萧统承袭,《文心雕龙》将“七”归入《杂文》,而《文选》亦将“七”体看作独立的一体,列于“骚”后。《隋志》中七体与赋文献分别著录,反映出了六朝时期七体与赋分离的实际情况。

再看对颂体的辨析。两汉赋、颂不分,赋不仅可以称为辞,也可以称作颂。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相如奏《大人赋》,又曰“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又如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称:“屈原作《九歌》、《九章》之颂。”扬雄《甘泉赋》,王充《论衡·谴告》称之为《甘泉颂》。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马融《广成颂》、《上林颂》,就受到挚虞《文章流别论》[3](卷五十六)[4](卷五百八十八)和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的批评,认为马融二作纯为赋体,却谓之颂,“失之远矣”。《文心雕龙》、《文选》均对赋、颂二体分别讨论和辑录,可知颂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与赋体分道扬镳。《隋志》亦赋、颂分别著录。

另外,设论对问体在汉代亦被看作是赋。许慎《说文解字·氏部》:“氏,巴蜀山名,岸胁之旁箸欲落堕者曰氏。……扬雄赋:响若氏隤。”[7]可见汉时《解嘲》亦谓之赋。后来随着文体辨析的发达,设论对问体也与赋分离。《文章流别论》就专论《解嘲》、《应宾》、《达旨》、《应间》等特点[9](卷一〇〇);《文心雕龙》中,设论对问体与七体在《杂文》中讨论;《文选》更细分为设论、对问二体,与赋分列。《隋志》亦著录有《设论集》、《客难集》,可见赋与设论对问体的的确是分离了。

对赋体的辨析其实只是魏晋南北朝文体辨析的一部分,而文体辨析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传统的文体学兴起于魏晋时期,而大盛于齐梁时代。这一时期的文论家,几乎无一例外均将很大精力投注于文体的研究,通过文体论来阐述他们有关文学本质、文学流变、文学风格乃至写作技巧等方面的意见,因而文体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文体研究已发展得相当全面和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赋体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渐渐明晰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的分类也逐渐完善。促成赋分类完善的因素有二。首先是对汉赋题材的开拓。魏晋南北朝时期赋在题材内容上,与两汉相较,有了更多的开拓。抒情、说理、咏物、叙事,各体俱备;登临、凭吊、悼亡、伤别、游仙、招隐、山水、鸟兽、

音乐、论文,无一而非赋之题材。其次是同题共作和拟作的大量出现。建安时期,“三曹”“七子”创作了大量同题赋;某些经典题材又代有拟作,这些赋由于题材相似,自然就被归为一类。可以说,赋作题材内容的多样化和同题共作及拟作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赋的进一步分类。对于赋作品的归类意识,魏晋宋人就已自觉,这种现象明显体现在当时的文章总集和赋序中。如陆机有《遂志赋序》[3](卷二十六),该序就对各家“序志”之赋作了归类评价,另有谢灵运《归途赋序》[3](卷二十七),对“行旅赋”,即刘勰所谓的“述行赋”和萧统所谓的“纪行赋”,亦有归类评论。类似评论还有很多,可以看出,对赋类目的划分是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共同意识。作为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赋分十五,类目最为繁复。其划分标准虽常为后人诟病,但也反映出当时赋学发达之一面。

赋的辨析也促进了文章总集中对赋的单独辑录。晋人挚虞编《文章流别集》汇各体文章为总集,体例是“类聚区分”,这自然是对文体的辨析。《南齐书·文学传论》说“仲洽之区判文体”,可见以总集编选文章来辨析文体,是挚虞的一大贡献。但从《文章流别论》将骚和赋一并讨论看,《文章流别集》或许是将骚赋辑录在一起。《隋志》总集类“文章及评论之属”^③著录任昉《文章始》一卷,亡。两唐《志》均著录《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张绩补。传本《文章缘起》题任昉撰,《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殆张绩所补,后人误以为昉本书”。但《文章缘起》卷首《文章始序》,一般认为是昉所作。从该序看,任昉作此书的目的当是考镜各类文体的源流。正是这个原因,《文章缘起》在文体的分类方面,比稍后的《文选》和《文心雕龙》都更为繁复,计八十四类。《文章缘起》对文体的排列以赋、诗、骚开始,是现今可知的总集中骚赋分离的最早记录,对赋学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二 赋文献的整理、研究与著录

学术的形成,离不开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与著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赋文献的整理主要表现在对赋作的诠注和赋集的编撰两个方面,整理的成果又多为《隋志》所著录。

赋注至迟出现于东汉前期,如班昭为其兄班固《幽通赋》作注[2](卷十四)。到了东汉后期,赋注渐渐多了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时人为《汉书》所

作的注,如服虔、应劭、韦昭等人为扬雄、司马相如之赋所作的注。《隋志》著录有服虔《汉书音训》、应劭《汉书集解音义》、韦昭《汉书音义》等,可见注家只是因为这些赋被收入《汉书》而顺带注及。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注赋充满了热情,赋注数量大增。《隋志》著录的赋注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傅巽注《二京赋》,张载、刘逵、卫权注《三都赋》,蔡毋遂注《三都赋》,项氏注《幽通赋》,萧广济注木华《海赋》,徐爰注《射雉赋》,孙奭注《洛神赋》。音注和图赞有李轨、蔡毋遂《二京赋音》,李轨《二都赋音》,宋褚诠之《百赋音》,郭征之《赋音》,无名氏《杂赋图》。

另外,李善注《文选》多引前代旧注,有些可补《隋志》之缺^④。如《文选》李善注所引的薛综注《二京赋》、晁错注《二京赋》、司马膺注《蜀都赋》、皇甫谧注《南都赋》、曹毗注《魏都赋》、张载注《鲁灵光殿赋》、无名氏注《思玄赋》,《隋志》均未著录。骆鸿凯《文选学》曾以《隋志》所录与李善注所引对勘,此外又举出《水经注》河水、洛水注引袁豹、崔浩《西征赋注》,《史记·文帝纪》索隐引邢承宗《西征赋注》,亦为南北朝时期的赋注。《隋志》未著录的另有《甘泉赋集注》^⑤,注者有晋灼、应劭、韦昭等人。魏晋南北朝时,哲学和史学文献的注释已有“集解”的体例,如魏何晏有《论语集解》。《甘泉赋》之有“集注”,当与所谓的“集解”体例相同。除以上赋注外,还有一些赋注因为释文肤浅等原因,不受重视,后来已经亡佚了。如《文选·藉田赋》李善注云:“《藉田》、《西征》,咸有旧注,以其释文肤浅,引证疏略,故并不取焉。”可以想见,现在尚存和有线索可稽的赋注,只是当时赋注中的一部分。

与汉代相比,魏晋南北朝赋注的发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赋注范围的空前广泛。据《隋志》可知,京都赋、畋猎赋、序志赋、情赋、江海赋、杂赋均有人为之作注。二是同一篇赋多人为之作注现象的出现。如前所述,汉代虽有多人为扬雄《甘泉》等赋作注,但专意为此当自西晋始。如左思的《三都赋》,刘逵、张载、卫权均为之作注。三是赋自注的出现。从《隋志》看,这可能是从左思《齐都赋注》开始的。另外还有庾阐《扬都赋注》[3](卷七)、曹毗《魏都赋注》^⑥、郭璞《蜜蜂赋注》[9](卷一百四十七)、谢灵运《山居赋注》[8]、张渊《观象赋注》[10](《张渊传》)、颜之推《观我生赋注》[11](《颜之推传》)

等自注。其中尤以谢氏为著,他将自注之例发展到极至,释文是原文的若干倍,而且以释事数典、阐释义理为主,与赋文互相发明。四是赋音和赋图赞的出现。《隋志》著录的赋音有孔道撰《二京赋音》,李轨、蔡毋遂撰《二京赋音》,左思撰《齐都赋音》,李轨撰《二都赋音》,宋御史褚诠之撰《百赋音》,郭征之撰《赋音》;赋图赞有《杂赋图》十七卷。五是赋注范围由单篇作品扩展至赋总集和选本,如《隋志》著录有梁武帝《历代赋》,梁武帝曾命周舍、周兴嗣为之作注[12](《文学传》),《隋志》又著录有《杂赋注本》三卷、《百赋音》十卷和《赋音》二卷,亦当是为赋集或选本而作的注。

魏晋南北朝赋注多为名物字义训诂,这与赋的特点有关。骋辞大赋以铺张夸饰、竞富炫博见长,最能显示作者才力学问,左思《三都赋》更以精于考核为标榜。注这样的赋对注家是一大考验,注家对骋辞大赋也就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如《子虚上林赋》、《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均有多人为之作注。这几篇赋作自产生以后,一直受到后人激赏,加之大赋文辞之富,被讥为“字林”[13](《炼字》),故需要疏解之处很多。据《晋书·左思传》所载刘逵注《三都赋》之《吴》、《蜀》序和卫权为《三都赋》作《略解》序,可知二人为之作注的意图乃是“明物”,“研精所由,纷散其义”。

当时的赋注也偶有不限于名物训诂,进而开始探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如《文选》李善注引刘逵注《魏都赋》,比较王褒、扬雄、班固、张衡诸赋与此赋的优劣,言及文章构思,钱钟书先生认为:“指摘甚当,而抉发文心意匠,于全注殊为破体”,“果类作者恐读者着眼或未分明,而不惜卷帙通一顾也”[14](991页)。另《三都赋》李善注引有一段张载注,讨论了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及左思《魏都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异同。又如蔡毋遂《三都赋注》,同样涉及到对赋的艺术手法的评论[15]。

魏晋南北朝时的赋注多自发而为。如《潘岳〈射雉赋〉注》徐爰自述:“尝览兹赋,昧而莫晓,聊记所闻,以备遗忘。”[2](卷九)然亦有应命而作的赋注。如刘杳注昭明太子《徂归赋》[12](《文学传》),周舍、周兴嗣注梁武帝《历代赋》,蔡大宝注梁元帝《玄览赋》[16](《蔡大宝传》)等,皆为应帝王之命而作,可见帝王的重视也是赋注发达的原因之一。

与赋的诠注相比,赋集的编撰工作出现得略晚。

这一工作受到人们重视而普遍展开,是从晋宋之际开始的。对赋的编撰整理,是文学批评与历史总结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时蔚然兴盛,是有文学思想史的背景的。《隋志》“总集类”序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摯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从《隋志》看,最早的赋集是谢灵运所编《赋集》九十二卷。

《隋志》著录包括各类的赋总集有七部,即谢灵运《赋集》九十二卷、宋新渝惠侯《赋集》五十卷、宋明帝《赋集》四十卷、佚名《赋集钞》一卷、崔浩《赋集》八十六卷、佚名《续赋集》十九卷、梁武帝《历代赋》十卷。赋总集之外,是各专类题材的总集,即佚名《皇德瑞应赋颂》一卷、张衡及左思撰《五都赋》六卷并录、佚名《杂都赋》十一卷、傅玄等《相风赋》七卷、晋右军行参军虞干纪撰《迦维国赋》二卷、佚名《遂志赋》十卷、《乘舆赭白马赋》二卷等。此外,列在谢灵运《赋集》条之下的《乐器赋》十卷、《伎艺赋》六卷,从题目和卷数看,也应该是专类题材的总集。由于列在具有赋全集性质的谢灵运《赋集》条下,根据《隋志》“合其近密,离其疏远”的著录体例,《乐器赋》、《伎艺赋》或许是该题材的全集,它的性质与专类题材集《杂都赋》并不一样,后者或为该题材的选集[17](246页)。然后有佚名《述征赋》一卷、后汉傅毅撰《神雀赋》一卷、《杂赋注本》三卷、《献赋》十八卷、梁武帝撰《围棋赋》一卷、佚名《观象赋》一卷、孙愷注《洛神赋》一卷、张君祖撰《枕赋》一卷。还有赋的音训和图谱,包括李轨撰《二都赋音》一卷、宋御史褚诠之撰《百赋音》十卷、郭征之《赋音》二卷、佚名《杂赋图》二卷。

从《隋志》著录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赋集已经大量出现,既有赋总集,亦有赋别集;既有赋总集,又有其选编本、续编本;既有全集性质的赋总集,且有专题性质的赋总集;既有赋集,亦有赋的注本、音注本,甚至赋图。六朝赋集编纂之盛可见一斑。

除《隋志》总集“赋之属”著录的赋集外,《隋志·总集》“文章及评论之属”著录有南朝人编纂的文章总集也很多,有佚名《集苑》、刘义庆《集林》、佚名《集林钞》、沈约《集钞》、丘迟《集钞》、孔道《文苑》和萧统《文选》等。萧统《文选》今存;孔道《文苑》至宋时仅存十九卷,《宋史·艺文类》有录。王应麟

《玉海·艺文类》引《中兴书目》称：“孔道集汉以后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赋、颂、骚、铭、诔、吊、典、书、表、论，凡十属。”可以看出，在《文苑》中，赋不仅与骚分离，且列为第一。时至今日，《隋志》著录的这些文集除萧统《文选》外均已亡佚，然从这些集子的名称和与孔道《文苑》、萧统《文选》一起著录两方面推测，其中应当编选了不少赋作。

三 对赋的理论探讨

与赋的创作同步的是对赋的理论探讨。早在西汉初期，随着汉赋范式的奠定，赋论也随之产生。自从司马迁借鉴《诗》学思想提出了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的赋学研究，并确立了赋以政教为核心的价值定位，对后来的扬雄、班固均产生深远影响。扬雄的理论承上启下，其“丽以则”的价值标准亦影响不小。西汉赋评对“丽”皆有所认识，这表明“文的自觉”的因素已经产生。东汉时期，正统儒学观念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赋学几乎完全处于经学观念的笼罩之下。班固在西汉赋论的基础上，进而对赋的源流作出了史的勾勒，并提出了“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对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赋学产生深远影响。

两汉之后，赋创作的增多和赋集的大量编纂，必然需要对赋学进行理论总结。魏晋南北朝赋学是发生在“文学自觉”的大背景下。受这股思潮的影响，魏晋以后的赋论发生了与汉人赋论颇不一样的转变。虽然从《隋志》著录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没有专门的赋论专著出现，但是与汉代相较，六朝赋论材料明显增多。这一时期的赋论材料多散见于赋序、史传当中。两汉时期赋前加序的情况极为罕见，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赋前加序则较为普遍，这些赋序有的交代赋的写作背景，而有的直接表达了作者的辞赋观，如左思《三都赋序》、谢灵运《山居赋序》等。而史传继承迁《史》、班《书》传统，除收录大量赋作外，往往有史家对赋作背景及主题的交待和评论。

魏晋南北朝的赋学批评与赋创作基本同步，并与一定阶段的时代文化特征相对应，大致可分为建安、两晋和南朝三期。

建安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挑战，文人渐弃章句之学，文人的思想和情感得到双重解放。赋创作和赋批评与两汉相比都具有崭新风貌。曹丕《典论·论文》认为，包括赋在内的一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第一次把赋和其它文学创作等“立

言”放到“立德”和“立功”同样的高度。《典论·论文》又云：“诗赋欲丽。”“欲丽”之言，盖从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而来，但他就只突出一个“丽”字，而不管“丽则”与“丽淫”，反对寓讽谏于诗赋，开“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北堂书钞》卷一百载《典论》云：“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曹丕此论，套用了扬雄评屈原、司马相如优劣之模式^①，颇值得注意。比较而言，扬雄之论偏重于“丽以则”、“丽以淫”之优劣比较，偏重于儒家的“教化说”；而曹丕之论则偏重于文辞遣意之比较，是在“诗赋欲丽”这一总原则下对屈作、相如赋及扬雄赋的一个比较。可以看出，曹丕对赋体的思考和评论，主要反映在艺术方面，而摆脱了汉代评论“讽谏”说的束缚，体现了那个时代对艺术追求的新特点。

西晋是一个儒学复苏与玄学最终渗入意识形态的时代，赋论有很大进步。除散见于赋序和史传外，重要的赋论材料有陆机《文赋》、陆云《与兄平原书》、左思和皇甫谧《三都赋序》及挚虞《文章流别论》等。有学者根据总体特征上的差异，将他们分为以左思、皇甫谧和挚虞为代表的“讽谏征实派”，及以陆氏兄弟为代表的“体物浏亮派”[18]（161页），大致概括了两晋赋论分立的特征。

左思《三都赋》成，作序表明了他的“征实”主张。皇甫谧亦为之作序，除继承了左思“征实”主张外，对赋体的特征，亦有新的认识。皇甫谧说：“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2]（卷四十五）观皇甫氏之言，第一，“古人称不歌而颂（诵）谓之赋”、“因物造端”语出《汉志》，是继承了刘歆和班固的说法^②；“欲人不能加也”，是用的扬雄的说法^③，说明他是在汉人赋学观基础之上立论。第二，皇甫氏又在因袭旧说的基础之上有了值得注意的新的阐释与发挥，如他说“敷弘体理”，“体理”盖指结构谋篇与阐明事理、写作意图两个方面。又如“引而申之”以下，重点强调与肯定“文必极美”、“辞必尽丽”的“美丽”之赋，更是新创之见。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曹丕赋“欲丽”之阐释，此前无人道也。皇甫氏弟子挚虞承袭了老师

之说,其《文章流别论》称:“假象尽辞,敷陈其志。”主张赋应该通过想象、饰辞、铺陈以表现情志。他还指出汉大赋有四过,即“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也就是汉大赋违背了征实的原则。这种征实的创作主张虽多少有违文学创作规律,但他以“类、事、义、情”四者立言,则是很了不起的,开多视角评赋之先河;又以“大、壮、理、美”为之辅,希望不要“过”,则是对赋的“艺术特质”的深层次阐释。

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又云:“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这可以说是体物浏亮派赋论的总纲领。陆机所论,又在曹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体物”、“浏亮”更能概括魏晋南北朝赋的总体特征。“赋体物而浏亮”这一命题的提出,是玄学培养了高度的思辨能力,玄学思维导入赋论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非凡意义。

《隋志》“总集及评论之属”著录有刘勰《文心雕龙》十卷。《文心雕龙》是六朝时期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诠赋》及《才略》、《夸饰》等篇中,对赋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关于赋的起源,刘勰援引“《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云云,乃继承汉晋赋论为说。其目的仍然是强调赋的讽谏美刺功能,从而“风归丽则,辞翦美稗”,达到情义辞采完美契合的境界。刘勰又把赋的文体特征概括为“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完全符合《文心雕龙》全书中刘勰稳妥而又折衷的文学观。关于赋的演进,刘勰因袭班固

辞赋观,认为屈原的《离骚》是从“不歌而诵”的“赋诗言志”之赋发展到“作赋言志”的赋文体中间的一环,其特点是“始广声貌”。然而,《楚辞》还不是赋。直到荀况《礼》《智》和宋玉《风》《钓》等“极声貌以穷文”的赋出现,才真正“与诗划境”。班固、皇甫谧、挚虞都将荀况、屈原并称,以为是古诗之赋的作家。直到刘勰,才把屈原从赋家的行列划分出来,并在“文之枢纽”中别立《辨骚》一篇。骚和赋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不同文体的观点终于得到确认。《文心雕龙·诠赋》是中国赋学史上的扛鼎之作,对此笔者另有专论,兹不赘。

要之,从《隋志》对赋及相关文献的著录可以看出,赋体创作继两汉之后,至魏晋南北朝达到高峰,几乎与诗歌和乐府创作鼎足而三;文体辨析也已相当发达,出现了挚虞《文章流别论》这样的文体辨析专著,楚辞、七体、颂、设论、对问等体先后与赋划清界限,赋的外延和内涵已趋明晰,而《文章缘起》实开风气之先,将骚赋分别辑录,影响深远;赋作的论注风气大盛,赋集的编撰和《文选》等文章总集中赋类的编选也数目巨大;赋论更是相当发达,大量赋序表达了这一时期的作家与汉代异样的赋论思想,刘勰更在《文心雕龙》中对赋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汉魏六朝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赋”与“楚辞”相似,也已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作品范围、研习传统和研究格局的专门之学。

注释:

①参《隋书·经籍志·序》,又参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

②《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录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傅子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曰《七林》。”王应麟《玉海》卷五四云:“傅玄作《七谟》,又集《七林》。”

③此用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分类条目,《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④汪师韩《文选理学校舆》列旧注家二十三人,其中有些只是李善注引其说,未必其人曾作注。如《吴都赋》注引刘成、殷仲文之说,又如《南都赋》注引皇甫谧说,出谧《帝王世纪》,非谧曾为赋注。

⑤《文选·甘泉赋》下李善注:“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例其姓名,亦称臣善以相别。他皆类此。”

⑥《文选》卷四《南都赋》李善注引曹毗《魏都赋注》:“侯桃,山桃,子如麻子。”

⑦《文选·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扬雄《法言》:“或问:屈原、相如孰愈?曰:原也过以浮,相如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相如亮不可及。”

⑧《汉志》作“感物造端”。

⑨《汉书·扬雄传》作“竞于使人不能加也”。

参考文献:

- [1] 万光治. 汉赋通论[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9.
- [2] 萧统. 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3]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 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5] 阮孝绪. 七录序[A]. 道宣. 广弘明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6] 李大明. 楚辞文献学史论考[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7.
- [7]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8]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9] 虞世南. 北堂书钞[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9.
- [10]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1] 李白药. 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2]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13] 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4] 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5] 参: 罗国威. 左思《三都赋》綦毋邃注发覆—《文选》旧注新探之一[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4, (6).
- [16]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7] 傅刚. 昭明文选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18] 程章灿. 魏晋南北朝赋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Sui Shu Jing Ji Zhi and Fu School in Wei Jin Nan Bei Periods

FAN Zeng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Sui Shu Jing Ji Zhi* and relevant materials, in the historical cause of cultural academ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ei Jin Nan Bei Periods, due to the developed discrimination of writing types and gradual distinction of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fu, fu develops into an independent writing type differentiated from such writing types as sao, qi, song, etc, and is separately recorded by catalogues. Fu documents are sorted out and studied on a remarkable scale. Compared with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in the Han Dynasty, studies of fu becomes systematical and rich in materials during the periods.

Key words: *Sui Shu Jing Ji Zhi*; discrimination of fu; Wei Jin Nan Bei Periods; fu school

[责任编辑:唐 普]